

史说法治

唐宝民

袁崇焕是明末著名的文官将领，带兵守卫山海关及辽东，指挥宁锦之战、宁远之战，使清兵无法突破宁锦防线，确保了明朝东北边疆的安全。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功臣，日后却被崇祯下令处以极刑。

崇祯杀袁崇焕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袁崇焕“擅杀毛文龙”，毛文龙是皮岛守将，官拜总兵官，但袁崇焕却认为他有欺君罔上、假冒战功、私通敌国等多项罪名，在没有请示皇帝的情况下，把他杀掉了。

毛文龙到底该不该杀？历史学家一直存在争议，在此不做讨论，我想说的是：皇帝的确给了袁崇焕权力，但袁崇焕不应该“有权就任性”；退一万步讲，即使毛文龙罪该万死，袁崇焕也不应该擅自将他杀掉，而应该将他押送到京师，交由崇祯皇帝处理，这样擅杀大将，的确是一种擅用权力的行为，这也为日后崇祯杀袁崇焕埋下了祸根。可见，“有权就任性”是一件危险的事。

有权不可“任性”

作为手握权力的官员，应该做到“有权也不任性。”

据史书记载，有一次，大将军卫青带兵从定襄出征，苏建、赵信领三千兵马从另一处出征，共同讨伐匈奴。但苏建和赵信的军队遇到了匈奴大部队，被匈奴大军围困，双方交战了一整天，汉兵全军覆没，赵信投降了匈奴，苏建独自冲出重围，逃回到卫青的大营。卫青便对卫青说：“大将军出征以来，从未斩过副将，现在苏建弃军逃跑，应该将他斩首以树军威！”其他将领也认为应该把苏建斩首；卫青虽然战功卓著，但他是个从来都不任性的人，为人处世非常谨慎，听完大家的建议后，说道：“我以皇亲的身份在军中效力，不担心没有威严。周霸劝我树立威严，大失做臣子的本分。即使我的职权可以处决部下，而以现有的地位和所受的宠幸，我也不能擅自专权，不能在境外擅杀大将。我把他送到天子面前，请天子裁夺。”

于是，便把苏建囚禁起来，押送到了皇帝那里，皇帝后来果然赦免了苏

建的死罪。卫青有自知之明，有权也不任性，所以才能一直得到皇帝的信任。

其实，有权最容易任性的人是皇帝，因为皇帝拥有的是至高无上的、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虽然从古至今，任性的皇帝占绝大多数，但“有权也不任性”的皇帝还是有的，唐史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唐玄宗刚继位时，有一回，宰相姚崇在玄宗面前评议侍郎等一些中层官员的优劣，这是唐朝的一项制度，由宰相进行评议，给皇帝做参考，最后由皇帝表态、择优任用。在姚崇评议过程中，玄宗显得漫不经心，好像对这次评议之事根本不关心。姚崇心里就没了底，七上八下的，不知道如何是好。姚崇评议完了，就征求玄宗的意见，但玄宗却不表态。姚崇再三征求他的意见，玄宗仍然不发表意见，姚崇无法得知玄宗在想什么，就不敢继续评议，小心翼翼地退了下去。

姚崇走后，高力士在一旁提醒玄宗说：“陛下，您刚刚登基，应该和大臣们一起评议裁决，汰劣择优，这是惯

例。刚才姚崇多次向您申明理由，希望得到您的支持，可是您一直不表态，这样姚崇怎么工作呢？您是不是不满意姚崇的这个评议呢？如果不满意，也应该明白地表达出来您的意见，让姚崇改正啊！”玄宗听完高力士的话，笑笑说：“我对姚崇的评议没有意见。我之所以不表态，是因为我认为评议这件事不是我应该管的事。朕把管理国家的重任交给姚崇，朕只参与制定大政方针，至于考察任免中层官吏的事，那是宰相的职责，姚崇认为称职就大胆任用，认为不称职就果断免职，这样的事还用得着朕表态过问吗？”高力士听完，才知道原来玄宗之所以不表态，是意在放权，顿时心生敬意。

事后，高力士把玄宗的真实想法告诉了姚崇，姚崇也很感动，从那以后，姚崇就放开手工作，凡是宰相职权内能决定的事，就放心大胆地做主，很快，朝廷上下就出现了新的气象。玄宗知道自己应该管什么、不应该管什么，懂得给部下放权，有权也不滥用，这就是“有权也不任性”。

杨宏伟

三部大法开先河

开国三大法典：临时宪法《共同纲领》、《土地改革法》、《婚姻法》，都起源于红色圣地西柏坡。

《共同纲领》诞生。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号召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旨在制订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一致遵守的共同纲领。10月初，周恩来在西柏坡开始领导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工作，在李维汉主持下起草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第一稿。1949年初，经过修改，形成《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第二稿。2月27日，周恩来批示将《纲领草案(第二次初稿)》和有关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其他4个文件汇集在一起，以《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为名集印成册、付诸讨论。6月下旬，周恩来亲自动手，把自己关在中南海勤政殿，专心致志，起草共同纲领。毛泽东的《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两篇著作成为起草共同纲领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共同纲领草案稿五易其稿后，于8月22日前夕形成了题为《新民主主义共同纲领(草案初稿)》铅印稿。8月22日深夜，周恩来将铅印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周恩来、胡乔木等立即对《新民主主义共同纲领(草案初稿)》，进行技术性的结构调整与修改工作。经过10余天的紧张工作，9月5日，形成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随后，经过充分的民主协商，沟通思想，反复讨论修改，使《纲领(草案)》日臻完善。

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9月21日，周恩来向出席首届政协会议代表报告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草经过。29日，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从《土地法大纲》到《土地改革法》。1947年7月17日—9月13日，受中央委托，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村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并作了报告和总结。会议总结了1946年5月4日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发布以来土地改革的情况，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同年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公布施行。《中国土地法大纲》共16条，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的颁布实行，彻底摧毁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极大推动了新老解放区的土地运动，广大群众参军支前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从根本上保障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在原《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基础上，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同月30日公布施行。共6章40条。

中央妇委在西柏坡起草《婚姻法》。1948年9月，作为迎接新的人民政权工作的一部分，党中央在河北西柏坡召开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会上，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将起草《婚姻法》提高到新中国制度建设的高度，并将这项工作交给了中央妇委。中央妇委随即成立了以邓颖超为组长的起草小组，帅孟奇、杨之华、康克清、李培之、罗琼等人参加，具体执笔是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的王汝琪。中央妇委与中央法律委员会合作，以1931年中央苏区《婚姻条例》和各抗日根据地婚姻条例为重要参考，并分成若干小组到已解放的城乡进行调查，了解当时各解放区人民群众的婚姻家庭生活状况、政府颁发的婚姻条例及实施经验，对土地改革后农民的觉悟程度，特别是广大群众反对封建婚姻的迫切要求进行了反复考察。1948年冬，中央妇委与中央法律委员会拟出草稿，得到刘少奇原则批准。1949年3月，中央妇委将草案带进新解放的北平。1950年1月，中央将《婚姻法》草案分别送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中央法制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以及政务院政务委员会、司法机关征求意见并修改。其中，毛泽东两次亲自主持召开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委员、政务院总理、副总理及全国政协常委等参加的联席座谈会讨论草案。4月13日，中央法制委员会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提交《婚姻法》草案，经会议讨论通过后，于1950年5月1日正式颁布施行。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婚姻法》第一次从法律上确立了女性在家及乃至社会中与男性完全平等的地位。从此，买卖妇女，包办婚姻，招童养媳，纳妾多妻等丑陋现象为法律所不容。

(作者为西柏坡纪念馆纪委书记)



资料图片

西柏坡：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三)

亲情感悟

远去的顶针

郑延梅

当电视里一枚闪着银光的顶针出现在我眼前时，我的心顿时“咯噔”了一下。

三十年前，我的脚上每天穿着母亲亲手为我做的布鞋。夜晚，母亲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带着顶针穿针引线，一直到深夜。心灵手巧的母亲总是为了给我做一双既别致又漂亮的布鞋而绞尽脑汁。她会一笔一画的在草纸上画出草图，或是镶嵌一片扁豆；或是剪一条金鱼；或是绣一支梅花。鞋子在母亲的精心设计与缝制下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每每穿上母亲亲手做的布鞋，我都会品尝到爱与自豪的味道。

二十多年前，我曾在母亲的教导下纳过鞋底。起初，我看到母亲纳鞋底，心里感觉好奇，自己也想着试一试。趁母亲做饭的间隙，我偷偷拿起鞋底使用顶针。刚一使劲，我便“啊”的一声。针的一头扎在了我的中指上。母亲闻讯跑来，看到我的狼狈样，不忍心埋怨我。她轻轻地安慰我，没事，很快就会好起来的。那一次，母亲教会了我怎样使用顶针。我小心翼翼戴上顶针，针慢慢在顶针的作用下向上蠕动。渐渐的，我看到了针尖。喜出望外的我高兴得喊，“针出来了，针出来了。”就这样，在母亲的悉心教导下我学会了纳鞋底。

很久以来，顶针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与脑海。如今，人们不再穿妈妈做的千层底。穿的要么是光鲜亮丽的皮鞋，要么是漂亮时尚的运动鞋。

在这个顶针渐行渐远的年代，我突然很想念它。世间，有些事物会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变得遥远，甚至消失。但是，有一种东西却是亘古不变的，那就是母爱。

长镜头



给母亲拍张照

文/图 任寒霜

再过几天就是母亲节了，为了感恩天下所有的母亲对子女们无微不至的爱，我们选了两个有关母亲的照片故事。

上图，98岁的张富荣老太太，在艰苦的环境里把7个女儿培养成人。目前她已是五世同堂，膝下有132口人。这不，孩子们来了给她洗脚，小重孙女看着她妈妈给太姥姥洗脚，也主动跑上去给妈妈捶背，爱在这个家里得到了传承。

下图，聂红梅，退休教师。她有5子1女。年轻时，丈夫下放回乡，她挑起了家庭的重担，靠着每月8元钱的薪金省吃俭用，即使如此她也要让6个孩子上学受教育，并全部学业有成。



给局长算卦

曾勇

市文艺学校声乐系今年拟招八十名新生。校长郎万福擅自提高录取分数线，使得上线考生仅为五十人，余下三十个名额由他一手掌握着，用以做人情捞钱。

对于郎万福的这一做法，全校上下满是怨言。也是年轻气盛，声乐系新来的教师小高一气之下干脆去了上级主管部门市文化局，找一把手杨局长反映情况。不料杨局长当面表现得很重视，言之凿凿要派人下去调查，如情况属实立即严惩不贷，事后却无端拖延不了了之。

这天下午，小高因难以打通杨局长电话再次来到市文化局找他询问这

事的处理情况。可气的是杨局长一见面便借口外出开会躲避。“开会”回来后，见小高还在办公室门口等着，就又谎称去厕所开溜……

眼看着过了下班时间，而杨局长又一去不归，小高只得快快离去。途径楼下传达室时，那看门的秃顶老头忽然支开门缝把他叫了进去。

“你就是文艺学校的高老师吧？”老头合上门压低声音说，“别来局里找杨局长了，没用的，以往你们学校没少来人告那郎校长，最后都没个结果。”

小高估摸秃顶老头知道得不少，便问：“该不是郎校长捞的好处里头也有杨局长一份吧？”

老头说：“那倒不一定。”接着话锋一转骂郎万福不是东西，说他外孙女

报考文艺学校声乐系总分排在57名，现在让郎万福这么一弄，不光要白花好些冤枉钱，还得四处找门路托人帮忙。

骂罢郎万福，秃顶老头说：“这样，我托人去给杨局长做做工作，看能不能让他转变思想管管那姓郎的。你呢，就出点活动经费，不多，有一百块钱就行。”

小高知道这秃老头是个临时工，也没啥背景，这时见他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心里禁不住发笑，但想想对方所要不过是区区一百块钱，便掏出钱包从中拈了一张百元钞票给他。

小高没拿秃老头的话当真，给钱后也没就细问便匆匆离开了，不想一周后秃老头把电话打到了声乐系办

公室来，告诉小高他已经请人找过杨局长了……

过了几天，文化局果然派来专家组，就校长郎万福的相关问题展开调查。

一个月后，郎万福被撤职。接下来，应文化局请求，市检察院经济科正式介入郎万福案……

小高大为惊喜，这才想起找文化局传达室那秃老头问个究竟。秃老头说：“我托的是办公楼前面街上那个算命的瘸子，他姓陈，是我老乡。听他说，杨局长这人挺信命，时不时找他算上一卦……”

“哎，快讲讲，他这次跟杨局长都说了些啥？”小高打断他的话语。

“他还能说啥，无非是说郎、杨相冲，狼会吃羊什么的呗！……”